论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吴正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承担着光荣的历史责任和使命，通过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各民族是通过长期交往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的疆域、中国的历史、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单位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自古而然，当代更建立在自觉的民族觉悟基础上。……它既是多民族的多元发展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两者相辅又相成。”我们当下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56个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形成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认同，从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

要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重任，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多创作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思想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这其中，尤其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深厚情感，并愿意为之奋斗、甚至必要时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和情怀。爱国主义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出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及为国牺牲的英雄人物。各民族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火热的民族斗争故事，歌颂英勇顽强的民族英雄，这对于引导各族人民英勇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行列中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湘西苗族作家沈从文，他曾经说他要构建“希腊人性的神庙”，但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书写了不少关于抗日爱国的作品。他的《早上——一堆土一个士兵》便歌颂了老兵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气节，批判了国民党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湘西从“化外之境”迅速变成战场大后方，沈从文召集湘西同乡文武大佬谈话，要求他们“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十分重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描写。例如，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马嘶》中，《冤家的鞋子》与《马嘶》歌颂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彝族青年乌铁与汉族青年胡笙共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中去，在抗战的熔炉里，他们抛弃个人恩怨，互相关爱，舍生忘死，演绎了一曲感人的抗日之歌。这些爱国主义书写已经成为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要着力表现各族人民群众真善美的优秀品德。民族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熟悉人民群众的日常，感知他们的疾苦，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书写他们真善美的优秀品德，通过文学作品向广大读者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在这一点上，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很好的尝试。譬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湘西人淳朴善良，勤劳坚韧，重情重义，受人之惠必以涌泉相报，呈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笔下的土家人善良敦厚，礼让守信，坦荡真诚，在商业往来中体现着一种古朴敦厚的情怀，如《醉乡》里老乔保坦荡无私，而矮子贵二简直就是“仁义”的化身。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表现了蒙古族人的真挚热情、豁达开朗、坚韧执著与乐观向上的民族品德。总之，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在各个民族文学中的生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弘扬优秀传统美德，提炼人民群众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要积极表达这些优秀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流变。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即56个民族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在文化上，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多元一体理论”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向。我们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的历史现实，更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的存在是在中华文化这个“一体”的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与中华文化的“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坚持中华文化的“一体”的前提下，努力表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与交融，从而取得重要创作成就。譬如，老舍表现了北京满族人的文化，沈从文表现了湘西苗族文化，他们所表现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们表现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依然在于共同构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之得到健康发展，走向文明进步。正如苏雪林评价沈从文的创作时所说：“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因此，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他们也是大力加以批判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作家紧跟时代潮流，各个民族作家积极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譬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表现了彝族文化，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表现了蒙古族文化，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表现了壮族文化，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表现了鄂温克族的文化，阿来的《尘埃落定》和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表现了藏族文化……这些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中华文化整体中表现多姿多彩的本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往往是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各个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值得好好珍惜与发扬光大。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义不可辞的责任，是少数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指引，广大少数民族作家要肩负起历史重任，坚持爱国主义，塑造民族美的心灵，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枝繁叶茂，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旧书记 新文章

□阿 来（藏族）

《单位来了新书记》，是我给侯志明第一本散文集作序时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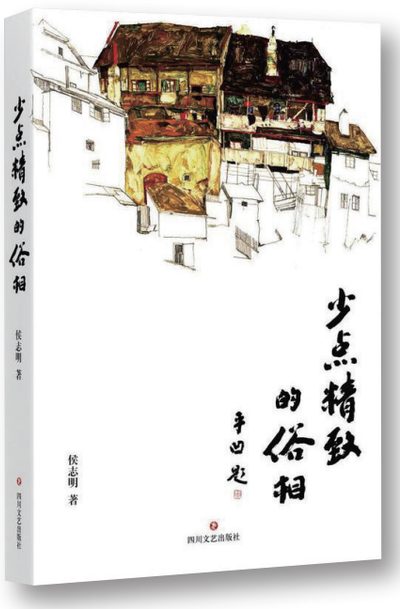
如今忽忽三年过去，新书记已经有点“旧”了，成了侯书记。那当然是正式场合叫的。在非正式的场合，有一天我突然警觉，怎么我不经意都称他老侯了。他比我年轻几岁，又在单位替我抵挡许多冗杂事务，我想这是表示熟稔和随之而来的亲切感的意思。

第一本书出来以后，这位前新华社记者便新作频出，不断在一些重要报刊发表。有时听见周围人议论，都说他写得越来越好了。虽说不是发表的全部作品，我也挑恰好在手边的读过几篇，也和夸他文章的同行是同样的感觉。至于说私下有没有和他表达过这个意思就不太记得了。

三周前，老侯来我办公室，送一本打印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这是他新集的文稿，说是要出第二本书了，依然要我写打头的叫作序的文章。

这下子就不是茶余饭后，或者某个时间闲聊时不经意的评价，弄得人要皱了眉头端坐着，想些正经话说。用四川话，就叫做：“拿话来说。”

这本新文集题目叫作《少点精致的俗相》，参阅他后记中的夫子自道，原来，其意



思是靠写作来“修炼”，以摆脱“俗相”，或超越人生庸常。“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人生嘛，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时代物质大进步，还加上房子车子票子和别的什么子，物欲层叠累积，不俗也难。何况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办公室小政治，大多数时候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弱点。在此情形下，文化的功能也主要变为让物欲重压下的人轻松一下，娱乐一下。所以，这时要以文化脱离“俗相”，也就成了有标高的追求。虽说自古以来，文化是引导人追求高尚品格和雅正审美功能的，但不得不承认，眼下，我们目睹的是这种功能的大面积弱化。于是，单单这个题目就让我有点严肃起来了。

这本文集的文章，我是分为三类的：一类是忆旧，以家庭亲情和怀乡为主；一类是访人写人，相当于记者的深度报道；再一类是游历记，到了作家协会，工作性质决定常常有带任务与不带任务的游走，或者看好风景，或者观摩新现象、新事物。

第一类文章，好与不好，修辞之外，重点在于一个情字。感情饱满与否，真切与否，决定文章的高下成败。在这本文集中，这类文章占了多半篇幅，每篇文章，或长或短，字里行间，都是有真挚的深情自然流露的。情的真切与深挚，还带来了一个修辞上的好处，不论着墨浓淡，都能收到去除雕饰、朴素自然的行文效果。老侯自己总结为文“三真”，真情肯定是第一要义。

第二类文章篇幅不多，相当于新闻报刊上的深度专访。对象是曾经的风云人物，比如氢弹之父于敏，比如曾创造长虹奇迹的倪润峰。两篇文章与常见的人物专访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加了一重对当时访问情景的追忆。时光流逝，洗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过去的辉煌，今日的沉静，两相叠加，可以悟人生、悟命运，也是让人去除俗相的好办法。

第三类文章，大家都去游历，各人都有选择性看见。看见什么，又能了悟什么，就有点高下与雅俗之别。这个“别”是种区分，也是种鉴别。“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有不同都从同中来，所有同中又可以看见种种不同。老侯是下了探幽抉微的功夫的，是力争要在看见之外还有看见的。

最后想说一点，这三类文章的结集，通常会被叫作散文集。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散文是什么？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很多时候，散文已经被一些写作者弄得很狭隘了。弄成了一个与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相对应的文体。但散文应该是更宽泛更广大的。很高兴看到，单位的这位已经有点“旧”的书记提笔为文时，只是感到有话要说，就服从这个愿望把内心话说出来，有事说事，有情抒情，有理论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此种写法，已经就避免了某种固定程式散文“精致的俗相”。更不要说，书写经验，行文中又争取超越经验，这也可以视为其“时时检点自己俗相”的可靠途径。应该鼓掌。

古人诗说：“文章乃余事，学道探玄窟。”余事是小的，但借此要“学道”，要超越日常生活层面，试图洞明世事，那么“探玄窟”就别有意义了。

有点“旧”的书记文章却有“日日新”的努力与成效，再次鼓掌。

■创作谈

河流，诗歌，遥远的路

□曹有云（藏族）

毫无疑问，人类都是逐水源而居的群体，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概莫能外。世界几大文明形态也都是在几大河流两岸生成并繁荣发展起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是这样几条河流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孕育、催生了我关于诗歌的直觉、灵感、语言，以及澎湃不息的文学梦想。

我出生在青海湖以南一个农牧业交融并存，汉、藏、回等多民族杂居共生的村庄，村子距离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不到两公里远。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当大雨过后水流量暴涨，夜晚躺在炕上便能听见黄河巨流奔腾不息的涛声。就是在这条伟大河流的岸边，在这个博大神奇的“摇篮”里，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和书声琅琅的少年时光。也许就是在那时，黄河雄浑沉郁的涛声和它不舍昼夜的流动感发了我关于诗歌声音、节奏、韵律、色彩、形式、质地的鲜活感觉和若水般真善美的无上境界，使我在很早时就体验到了诗歌作为一切文学艺术形式的古老源头的万千气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来到黄土高原一个名叫临洮的城镇读书。临洮，顾名思义，依临洮河水而居得名。如此，悠悠洮河又陪伴我度过了四年的青春寒窗岁月。洮河虽远不如黄河如雷贯耳，但也绝非无名之河。它早就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笔下：“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洮河还因其河床地带盛产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优质材料而闻名于世。洮砚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而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临洮也是甘肃乃至西部久负盛名的文化名城。这里民风淳朴，重教崇文，诗教传统绵延至今，兴盛不衰。在学校里，无论师生，读写诗歌蔚然成风。因此，我很快就加入了学校文学社团组织，也就是自那时起，我第一次碰触到了“朦胧诗”，知道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当然还有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有幸在激情飞扬、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就读到了他们陌异奇崛、博大深沉的崭新诗篇。同时，我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雪莱、拜伦、雨果、波德莱尔、惠特曼、泰戈尔、聂鲁达等大量外国诗人的诗集，第一次隐约看到了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世界诗歌景象。这些作品共同滋养了我之后不无艰辛的漫漫诗歌求索之路。在西北黄土高原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突然听到一位名叫海子的青年诗人自杀的惨烈讯息，后来又从一些小报边角读到了海子的诗歌。初读海子诗歌时那种电闪雷鸣般的激烈、兴奋和一往情深，犹如遭遇初恋，迄今刻骨铭心、不可淡忘。也就是自那时起，我在静静的洮河边默默开始了自己的诗歌探索并持续至今。

毕业后我来到青藏高原腹地柴达木盆地，在新城格尔木工作、生活。奇怪的是，这里虽是万年寒荒的瀚海戈壁，但河流还是在流淌。在这个城市的西缘，有一条河就叫格尔木河，自雪域昆仑一泻千里，奔流而来。“格尔木”，在蒙古语中意为河流汇聚的地方。在大漠深处，如果没有这条河流和众多湿地的滋养，就绝不会有这片绿洲，至于这个城市后来的开发建设乃至迅速崛起更加无从谈起。同样，没有格尔木这片土地的慷慨赐予，我20余年的诗歌写作也无从谈起，因为我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在这个城市、这条河畔行吟而成的。记得是在格尔木一间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青海有个诗人叫昌耀，第一次读到了他河流般汤汤而来的作品《慈航》。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阅读《慈航》，大声诵读《慈航》，还随手写下了近万字的《〈慈航〉日记》发在了《西藏文学》。也就是在史诗般磅礴的诗篇《慈航》的感召之下，我曾几次前去800多公里之外的省城西宁拜谒昌耀先生，受到了他的接见、教诲，使我受益终生，感念至今。而在格尔木唐古拉镇境内，便是中华民族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海拔6000多米、女神般缥缈圣洁的格拉丹东雪山，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审美的洗礼。

也许是冥冥之中领受了命运之神前定的召唤，如今，我又来到了天才诗人海子追寻、漫游并无比感伤地吟唱过的城市——德令哈。“德令哈”，在蒙古语中意为金色的世界。无独有偶，河流，还是河流，再次眷顾了我和我的诗篇。巴音河水自白头的祁连山脉倾泻而下，穿城而过，将金色的德令哈划为东西两岸。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命运之途无论如何起伏转折，如何悲欣交集，我的生命和诗歌都从未离开过河流，正如吉狄马加在《感谢一条河流》中所说的那样：“我知道那命定的关于河流的情结/会让我的一生充满了甜蜜与隐痛”。是的，是水，是河流，而不是别的什么涵养了人类坚韧的生命意志和道德智慧的文明奇迹，启示了伟大而不朽的壮丽诗篇。

这里，离天空、诗歌和信仰最近的高地，星空般浩瀚无尽的英雄史诗如歌传唱，河流般悠扬苍凉的蒙古长调随风飘荡，篝火般热烈奔放的民歌弥漫四野。这里，一切都仿佛如昨，美好如初，没有尽头，没有结束，正在隆重开幕，正如那周而复始、重新启程的万里江河。

河流，诗歌，遥远的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培训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3月29日至30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华南片区）培训交流会在深圳举行。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之一，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中国民协具体实施，收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献，编纂出版《大系》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华在会上介绍了大系工程的整体进展。据介绍，大系出版工程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果。实际启动编纂省卷本共195卷，进入编校出版程序的共30卷，已出版12个示范卷。在大系出版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方面，2020年已启动数据库三期和应用平台建设工作。

社会宣传工作也是大系出版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大系出版工程通过一系列以民间文学为主题的活动，促进民间文学的普及与传播。2020年，组织了“中国北方民歌那达慕暨北方民歌生态保护与传习座谈会”“传统‘二人台’与民间‘二人转’小戏研究与交流展演”等活动。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民间文学对儿童成长的滋养不可估量。过去，一代代的孩子聆听着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故事长大，从中接受文化熏陶，塑造朴素的价值观念。据了解，大系出版工程的社会普及系列读本已于2020年启动实际编纂工作。中国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争取推出一批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读物，配合小学教材进行民间文学的延伸阅读。同时，尝试与其他机构合作，用动漫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民间文学走进大众生活。

本次培训会邀请到江帆、刘晔原、向柏松、徐华龙、高荷红、王晓葵等专家，就“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史诗”“谜语”等种类的编纂体例、编纂要求、编辑方法等内容开展培训讲座。来自福建、广西、江西、海南、广东和深圳市民协的负责人，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省区分卷的主编、副主编，中国民协、广东省民协、深圳市民协的工作人员近4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交流会。中国文联出版社派出责任编辑参会，介绍编辑出版政策，并就两年来《大系》编校工作经验、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做交流。

（欣 闻）